



坚定文化自信,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的天职,也是当代中国人的神圣使命。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思维方式、价值原则和学习从政者的人格操守,化古之道术为今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是传统文化研究者的当代使命。

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形态,在数千年历史演进和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与小国寡民的古希腊城邦制国家不同,追求天下一家、天下为公的“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和建国君民的重要诉求;与古希腊城邦治理以民主为第一要义不同,中国作为“大一统”的国家,其治理以民本为第一原则。自《尚书·大禹谟》开始,中国先民便已认识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在养民,让人民过上的生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众才是国家的基础,这个基础稳固了,国家才能得到有效治理。与西方以法治为首位的“硬治理”方式不同,中国传统治理方式是以德化治道为首位的“软治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是一种以德服人的“软治理”,“软治理”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不为,乃是不治而治,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不露痕迹的治,达到治于无形的化境,这是治之极致,即孔子所强调的“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国家治理的最高形态,只有君主达到“内圣外王”境界才能得以实现。当教化真正落实了,化民成俗,“人人皆君子,家家乐圣贤”,自然可



以实现“无为而治”。

事实上,中国古代尧舜以下无圣王,普通君主治理国家仅寄望于“恭己正南面”的“垂衣拱手而治”是远远不够的,即便是大禹也需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需要“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敬业精神,何况境界在禹之下的人?禹之下的政治人物,治国之能臣、文吏更需要积极作为。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倘若没有政治家积极作为,想要长期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自虞舜时代起,刑罚就开始被用于治理国家。《尚书·舜典》记载:“象以典刑,流有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中国传统的治理方式并不排斥“硬治理”,更不否认律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孔子认为,律法治标不治本,治外不治内,是手段,不是目的。它只是防止社会向下坠落的制动力,不是引导社会向上、向前发展的牵引力。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治治已病,不能治未病,而德治治未病,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强人的“体质”,预防发病。简言之,道德教化虽不是万能的,但比法律惩罚更为根本,更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治理过分强调人治,缺乏规则性规范、制度化安排,权力掌握者主观性太大、随意性太强。其实不然。仅就中国古代的官吏选拔而言,从周代的“乡举里选”到汉代举孝廉、举茂才的察举制,再到曹魏时期的九品中

正制,最终完善于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取士制度。选官制度的演变过程是一个逐步完善且制度化建立、健全的过程,也是逐步走向客观、公平、公正的过程。为防止官吏腐败与情政,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一套制度化安排,如朝议制度、谏议制度、异地任官制度、上计制度、监察制度、仕进制度乃至休假制度、丁忧制度等。这些制度性设计的不断优化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保障。

“无为而治”是境界形态的治理方式,是治理的理想模态,如果没有圣人的道德修养与感化力,追求“无为而治”可能会成为情政的借口。相比之下,贤君能臣“有为而治”则是现实可行的治国理政方式。作为领导干部,从事国家管理应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勤政爱民,国才能得治,政才能得理。

本书是对中华文明中政治智慧与治理之道的深度挖掘、全面展示和现代诠释。多位资深学者历经数载,从浩瀚的中华文明中提炼出诸子百家关于民本、尊贤、用人、臣道、革新等方面的思想精髓和治理智慧。这些思想跨越千年,照亮当代人前行的路,助力每一位渴望有所作为、渴求卓越的读者,以智慧为舟,以担当为桨,驶向“有为”的彼岸。作者结合现代语境,对这些思想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针对当代问题和社会痛点提出思维方法和解决方案,纾困解难,以期通过今天的积极“有为”,实现明天的“无为而治”。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曲阜师范大学乡村儒学研究院院长)

人工智能时代下创造力研究要走向何方?

苏彦捷

创造力的认知和社会机制,同时也能够把握人工智能与心理学之间在理论层面的连接脉络。

二是对前沿科学问题的新探索。本书对人工智能自身创造力的界定与评估给予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关注。通过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积极回应《科学》(Science)杂志2021年发布的125个前沿科学问题之“机器人或AI(人工智能)能否具有人类创造性”。在人工智能已能广生成文本、音乐、图像等作品的当下,如何科学界定这些产出是否具备创造性,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心理学、艺术学与哲学交叉的复杂命题。作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核心挑战,结合心理学中关于创造力的经典理论与最新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不同模态下的生成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系统而具有解释力的评估标准与方法。作者通过追踪计算创造力的发展历程,勾勒出其背后的技术演化脉络与关键算法框架,帮助读者从机制层面理解人工智能如何“模仿”乃至“超越”人类的创造过程。这不仅填补了当前学界对人工智能创造力认知的诸多空白,也为未来相关技术的设计优化、模型训练目标的设定以及跨学科合作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此外,本书部分支撑论文对数智环境下媒体多任务如何提升创造力、人类如何应对生成式AI(人工智能)凸显等有关人工智能效应的“关键性”科学问题的研究已获得“突破性”进展,并发表于国内权威期刊《心理学报》。更为重要的是,书中一方面描绘了人工智能作为“自动化创造者”的实践潜力,另一方面也提示读者思考人类在创造力合作中的不可替代性。这种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融合视角,使得本书在强调实用性的同时,也不失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

三是对现实热点问题的新突破。本书通过大量真实案例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如何在实际操作层面有效促进创造力的发展。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令人目不暇接,许多应用场景已经远远超出了公众的原有预期。然而,如何将这一技术潜力切实转化为创造力提升的动能,依然是一个尚未被充分理解与掌握的课题。本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问题,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介入创造过程的多种路径,涵盖了从个体层面的认知辅助,到团队协作中的信息流优化,再到产业系统中知识管理与创新效率的整体跃升。更为重要的是,作

者特别强调了“人智协同”(human-AI collaboration)的全新创作模式,提出应当系统培养未来创造性人才的多层次、多维度人智协同创新素养。这不仅关注技术工具对用户知识与技能的赋能,更将态度、伦理、价值观等因素纳入人工智能时代下创新素养的核心构成之中。可以说,这一以实践为导向的内容不仅扩展了创造力研究的现实维度,也为产业创新战略的制定、教育改革中的创造力培养等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与操作指南。

四是对科学与实践问题的追问与反思。作者并未止步于技术与创新的表层光辉,而是勇于开展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在人工智能持续加速渗透社会各领域的背景下,技术乐观主义往往掩盖了诸多潜在的伦理隐患与制度性挑战。一方面,这些技术嵌入社会后很可能会引发不对称权力分布与结构性风险,如算法偏见、数据不平等、信息茧房和隐私侵犯等。另一方面,书中将进一步将视野拓展到人类主体性面临的弱化风险,细致探讨了自动化创新对人类自主意志的侵蚀、人机边界的模糊化以及个体在技术系统中逐渐被动化的趋势。在应对策略方面,作者并未流于抽象呼吁,而是提出了兼具操作性与可落地性的多层次建议,涵盖从算法可解释性的技术路径,到跨学科伦理治理框架的制度设计,乃至公众科技素养的培育与人文教育的强化。此外,书中还对当前法律制度在应对人工智能责任认定、权利归属与风险规避方面的滞后状态进行了前瞻性评估,并描绘出一种“人机共生”的未来图景——在这一图景中,技术进步不再以牺牲人类价值为代价,而是在人类伦理、社会制度与科技发展的动态平衡中共同演化。这为读者提供了穿越当下技术热潮的冷静视角,彰显了人工智能与创造力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

整体而言,《创造力与人工智能》是一部从心理学与技术融合视角深刻解读创造力新境界的著作,汇聚了作者团队在人工智能与创造力交汇领域的系统研究成果。同为高级认知领域的研究者,我由衷赞同作者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尤其如序言中所述,人工智能(蓝色)与创造力(绿色)如同自然中的青山与绿水,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滋养。“山水创造力”这一意象生动地诠释了科技与人文和谐共生的理念,强调了人工智能的真正价值在于尊重生命与自然,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本书不仅是一部技术与心理学交织的学术力作,更是一次对“智”与“仁”之美的深情礼赞,实现了科技向善与创新共荣的美好愿景。

(作者为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心理学会理事)



《创造力与人工智能》,周详、祖冲、崔馨馨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在国家全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同时,我们正迎来人工智能飞速演进的时代浪潮。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构产业生态、教育理念乃至社会治理模式,也正深刻改写着“创造力”这一人类核心能力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理解和把握人工智能时代下创造力的新特质、新机制,正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作者在《创造力与人工智能》中,通过系统的理论梳理以及缜密的实证研究,为读者指点迷津。全书共有9章内容,分别围绕“人工智能下如何理解创造力的内涵”“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培养与提升创造力”“人工智能如何催生出全新的创造模式”,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变革为创造力带来哪些挑战”等研究者颇感兴趣的关键问题作出了建设性的回应。作为一部优秀的学术专著,本书具有以下显著优点。

一是选题具有时代性与先进性。本书构建了一个系统且完整的理论框架,为理解创造力与人工智能的交互关系提供了坚实基础。尽管创造力作为一个研究主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但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创造力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仍不断被重新定义和持续拓展。本书作者不仅深入梳理了经典创造力理论,还结合其团队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涵盖了个体创造力、团队创造力等多个层面,向读者呈现出一个多维度、全景式的创造力研究视角。书中不仅就个体与团队层面的创造力概念进行了细致梳理,同时也深入其哲学背景与理论渊源,从人类智力研究出发,分析了人工智能如何在模拟认知、知识表示、执行任务等方面与心理学形成交汇。此外,书中也探讨了人工智能对心理学的反哺作用,如在情感计算、人机交互和认知建模中的具体应用,进一步说明两者在理论上相辅相成、在实践中互为支撑。通过这一交互框架,读者不仅可以系统理解个体与群体



《津沽大地上的奋斗足迹》,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

党旗引航津沽路,砥砺奋进海河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叙事谱系中,天津这座兼具近代工业文明与革命传统的城市,始终是观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暗夜举星火、奋楫新征程的典型样本。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联袂推出的《津沽大地上的奋斗足迹》一书,以其独特的“城市奋斗史”视角,将宏观党史嵌入海河两岸的街巷肌理,为读者呈现了兼具历史厚度与地域温度,融汇实践智慧与精神伟力的红色记忆。

从史观建构看,本书呈现了大历史观下的中微观叙事创新。该书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在传统编年体叙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采用“关键事件—重要人物刻画法”,以中微观视角,深度还原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创建,中共天津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发区大有希望”、“三个着力”重要要求的提出和深入贯彻等重要历史节点,聚焦革命先烈于方舟、民族英雄吉鸿昌、“蓝领专家”孔祥瑞等时代楷模,吸收近年来理论界、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血肉丰满的案例诠释津沽大地上不懈奋斗的时代精神。

从现实启示看,本书展示了历史中奋进智慧的当代解码。习近平总书记满怀深情地指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该书通过收集遍布津沽大地的奋斗足迹,并精心选配照片,串联起百年大党栉风沐雨、矢志奋斗的伟大征程,映照出新时代、新征程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盛世图景。100个专题不仅是对过去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启迪,让读者既能触摸到百年大党的执政智慧,又能感受到普通民众的奋斗脉搏;既能把握宏观历史的发展规律,又能体味微观个体的生命温度。

从叙事艺术看,本书达成了严谨性与可读性的高度平衡。尽管涉及大量史料分析,但是该书通过选取100个天津党史专题,将宏大的历史进程分解为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单元,采用“三明治式”叙事结构,上层铺陈历史背景,中层聚焦核心事件,底层挖掘人物细节,将严谨的考据转化为生动的表达,既避免了学术著作的艰深晦涩,又杜绝了通俗读物的浅表化倾向。每个专题独立成篇却又相互关联,如同海河支流最终汇入大海,共同勾勒出天津党史上海河儿女不懈奋斗的全景画卷。

殷殷初心如磐,时代答卷常新。这部由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著作,其价值不仅在于史料的系统性挖掘,更在于建立了“党的发展史—城市微观史—人物群像史”的三重对话机制。对于关注地方党史的研究者而言,这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更是津沽大地上,一把解读海河儿女奋进智慧的钥匙。

期待该书让世界通过天津这座城市的奋斗缩影,更深入地读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期待这样的地方党史研究范式能够启发更多城市书写自己的“奋斗传记”,共同构建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拼图。这部著作所展现的,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未来的路标——它提醒着我们,历史从不遥远,它就沉淀在每一条街巷的记忆里,熔铸在每一位奋斗者的生命中,并将继续书写在新时代的征程上。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